陳紹駒

個人簡介

1928 年生於廣州，原籍東莞。少時念私塾，後入讀廣州第六小學和第五十七小學。1938 年廣州淪陷，赴港投靠親人，後遷居虎門。1939 年再度來港，次年以軍人子弟身份，入讀廣東兒童教養院第七院。1942 年，升讀力行中學。1944 年，考入廣東省政府無線電班，被派往保安司令部通訊大隊。和平後，復員廣州，先後被調往海口及廣州灣。1948 年，逃至香港，於啟德機場無綫電臺工作。1954 年，轉至婆羅州。1964 年返港，於大東電報局工作，直至退休。

童年生活

我叫陳紹駒，讀書時的名字叫陳慎遵。原籍東莞街口，即現在的長安。1928 年，我在廣州出生，住在倉邊路的外公家，即仁和里對面。[1]我兄弟姊妹很多，包括兩個哥哥、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，妹妹排行最小。母親自小接受良好教育，其余氏家族為東莞虎門的首富之家，當年會請一些秀才來教導母親。由於父親聰明、讀書很好，故請了他去，後來更把女兒嫁給他。母親婚後生了六個男孩，又很想生個女孩，最後如願以償，生了妹妹。我們從小就由守寡的二伯娘照顧，後來母親請了一個奶媽來照顧妹妹，不料奶媽愛睡，結果把妹妹悶死了。母親本來就有肺癆，生了很多孩子後，病情加劇。妹妹去世後兩年，她也去世了。那時母親才三十六歲，我虛齡約十歲。母親去世後，爸爸娶了她陪嫁時的女傭，我們叫她彩萍姐。她的地位提升後，馬上變臉，變得不念親情。

至於父親，他排第六，還有一個妹妹，我們叫她七姑。父親畢業於英皇書院，1926 年免費入讀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，後來在廣州市西南中學教高中數理化。爸爸念英皇，和大伯爺陳秀峰有關。有一次，大伯爺在清水灣游泳時，遇上外國人。由於他會講英語，就跟那個外國人交談起來。後來那個外國人介紹大伯爺到美國讀書。畢業後，大伯爺在美國三藩市中國領事館工作，但不知是當清朝還是民國的秘書。後來他升為總領事，回國後就擔任汕頭海關總督。他有錢後就卸任，回到香港做生意。他叫父親不要留在鄉下，來香港讀英皇，然後考港大。當時香港

[1] 仁和里即現今東莞的仁生里。

出現大罷工，父親很討厭那些外國人的所作所為，就回到廣州，在西南中學教書，那時他好像還沒有在港大畢業。

大伯爺中年過身，他女兒的年紀和父親差不多，當時父親是同輩中唯一的男性。大伯爺很厲害，雖然中年早逝，但他與劉德譜，[2]還有另外一人共同創辦了油麻地公司，[3]那時候還沒有天星公司呢。大伯爺賺了點錢，但後來好像炒金失敗了。不過他那時已把財產轉到伯娘名下，以留後路。大伯爺有一個兒子，在香港長大，我們叫他守勤哥。1938 年，他在香港結婚，父親到香港主持婚禮。守勤哥娶妻的時候，很多人以為伯娘會把產業分給兒子，但她沒有。堂哥很孝順，和父親一樣，也是讀工程的。後來他去了雲南建設滇緬公路，沒想到不小心從高處墮下，撞傷了頭，結果變得癡呆，數十年來也是如此。而伯娘就把產業全部據為己有，直至去世。

當年父親主持堂哥婚禮時，見到一個遠房親戚，即我們的大姨婆。她女兒王少莪本來是越南華僑，在父親、丈夫去世後，大姨婆帶她回到香港。後來父親娶了她，帶她和彩萍姐一起回廣州。舉行婚禮時，哥哥和王氏兩個子女都在場，但我沒有出席。1938 年，王少莪和當時 60 歲的父親結婚，後來又生了一個兒子，我們一直有聯絡。1939 年，爸爸不做教師了。那時媽媽有個同學的丈夫叫王光海，他既是薛岳將軍的親戚，[4]又是他的秘書長。王光海叫父親一同去薛嶽將軍那裡做參謀。結果父親加入了長沙的軍隊，把王少莪也帶去了，他們在那裡就說是王光海的親戚。父親在那裡，又生了一個兒子。1939 年至 1945 年期間，他留在長沙。他是參謀，不須上陣打仗。

廣州淪陷

上小學前，我讀過私塾，但不夠十天就走了。私塾由那些穿長袍的秀才教授。上課時，三人坐一行，老師的兒子坐一邊，一位同學坐中間，我坐另一邊。有一次，老師的兒子欺負中間那個同學，我見義勇為，一個左勾拳，把他打得流鼻血。那時我只有五、六歲，立即被人趕走。「快拳轟鼻傷師子，見義勇為憶少年，重罰當堂遭

[2] 劉德譜，廣東寶安縣人，香港著名華人領袖劉鑄伯先生之子。年少時，活躍於港滬粵商界，曾獲國民政府三等嘉禾章。1924 年，與友人集資創辦油麻地小輪有限公司，並擔任總經理。

[3] 1920 年前，香港渡輪服務由多間公司經營。1923 年，香港總督司徒拔引入專營權制度，當時由以劉德譜為首的財團，取得來往中環至深水埗、旺角及油麻地航線間的航線專營權。後更名為「香港油蔴地小輪船有限公司」（The Hongkong and Yaumati Ferry Co. Ltd），簡稱「油蔴地小輪」。

[4] 薛岳，字伯陵，廣東韶關樂昌人。抗日時期的重要將領，曾獲中華民國一級上將。

革退，雙親待我卻如前。」這是我憶述此事的詩作。

於是，母親決定在家教我。入小學時，我不用讀初班，便直接從一年級下學期讀起。第一間念的是鄰近廣州六榕寺的第六小學，第二間好像是五十七小學，一直讀到 1938 年。我在正規小學讀到三年級，後來因逃難而暫時停學一年，直到入住兒教院後才繼續讀書。入讀兒教院時，須考試分班，我獲安排入讀第三班，再念一班便小學畢業。

1938 年 10 月，廣州發生大轟炸。我和兩個哥哥、弟弟及王少莪兩個兒子，七人一同逃難到香港。大哥和二哥出來工作，在九龍巴士當收票員，我和第六個弟弟則住在大伯娘家，鄰近長沙灣大球場。住了沒多久，大伯娘說地方不夠，我們只好離開。我們向她借錢，但過了不久，她便計較起來。父親來信說當年她兒子讀大學時，向他借了很多錢。當年堂哥在優先股沒到手前就到內地讀書，經常向父親借錢，打算日後繼承家產時才還給他。爸爸信中說堂哥所借的錢，已經夠我們全家開支。後來爸爸叫我們回廣州，因為情況稍微好轉了。所以我們在香港住了不足一年，便回去了。

回去後，因廣州被日本空襲，生活也艱苦，我們就回到虎門的祖家去。爺爺是中醫，買了屋子，住在虎門。回到虎門，我沒有讀書。當時我外公已經去世，因此不能投靠外公家。1938 年 10 月，日軍從惠州打過來，又轟炸虎門。虎門失陷後，我們經長安，在南頭乘船去香港。大概 1939 年到香港，那時好像快要過年，我們住在元朗堂姐家，即大伯爺的大女兒那裡。我們住了沒多久，就搬到英隆園鄰近的東頭村，即現在的元朗火車站。我住過東頭村，也住過英隆園。那時大哥和二哥外出工作，家裡只剩下我們幾個婦孺。

不久，彩萍姐兩個兒子死了，最大的也只有四歲。那時香港有很多小孩子去世，家人只用布包裹他們，放在白楊樹旁邊，待翌日黑箱車來收拾。記得那時天天都有黑箱車來。後來父親叫王少莪的母親、大哥和弟弟，先去長沙。他們先坐船到汕頭，後坐車經韶關往湖南長沙。二哥則在外工作，只餘下我和彩萍姐在香港。不久，爸爸說日本人快來了，不可住在元朗，要回家去。

後來廣州被日軍攻陷，爸爸寄錢來，叫我和彩萍姐也上長沙。那時我十一、二歲，便和彩萍姐坐白銀丸號去廣州，並在西濠口登岸。登岸後，住了兩天。當時日本人在每個路口加設碉堡，路人經過要鞠躬。我和彩萍姐走過時，剛好日兵進去了，我們便沒有鞠躬，不料他走出來大聲呼喝，我們便立刻回去，向他鞠躬。不過五年後，我十七歲，在軍隊當無線電訊員。那時輪到那個日本仔向我敬禮。所以說：「寧欺白鬚公，莫欺少年窮」呢！我們在西濠口，即廣州西車站，購票坐小船北上。那時蘆包是國民黨軍隊管轄的區域，沒有船直接前往。我們得先到麻奢，再轉往蘆包，然後在蘆包坐快船去韶關。記得那時麻奢位於交界處，屬三不管地方——國民黨不管、日本人不管、遊擊隊也不管。

1940 年，我在樂昌和爸爸會合。薛岳將軍是樂昌人，他派父親去樂昌九峰替他建祠堂和修祖墳。韶關上一點便是樂昌，樂昌再上就是坪石，過了坪石就到湖南。那時候王少莪又生了一個兒子，對我們不太好，我在樂昌也沒有讀書。所謂「一山不能容二虎」，彩萍姐在樂昌待了幾個月後，就加入了省政府在韶關辦的婦女生產工作團。二哥則在粉嶺的農藝園工作，當時農藝園的正團長是何雁淩，副團長是元朗鄉紳梁省德。我則進入兒童教養院。

兒童教養院

日本人佔領香港後，很多人逃到兒童教養院的發祥地韶關沙園。哥哥住在兒教院第七院，他見到兒教院生活很有秩序，就介紹我去了。當時何巧生是院主任，即分院院長。她的哥哥是父親在廣州市西南中學的學生，所以見面時他稱父親為恩師。後來爸爸、阿嬸、弟弟和我四人，在樂昌坐火車去韶關，找到沙園兒教院後，就把我們留在那裡。當時兒教院主要收留三種人，第一是軍人子弟、軍人遺孤；第二是經福利機構介紹來的孤兒；第三是從日本佔領區搶救回來的難童。因為父親是軍人，所以我就以軍人子弟身份，進了兒教院。

那時淪陷區的兒童，幾乎沒有機會讀書，即使有機會讀，也只能讀日文；加上日本人隨時殺害中國人，淪陷區兒童的處境十分危險。因此搶救兒童，成為當時國家的政策。兒教院成立的目的，就是搶救淪陷區的兒童。它接收的難童越來越多，加上不少軍人（尤其是湖南軍人）把子弟送來兒教院，所以我到兒教院數月後，沙園便額滿了。故此，兒教院便把一班人轉送到連縣去。兒教院人數增加，規模逐漸

擴大，所需經費也更多。當時宋美齡知道兒教院辦得出色，便派人來二院參觀視察。那人回去後，向她報告，說兒教院辦得好，於是宋美齡就資助了一、二、三院，所以同學們就有鞋子穿了。但資助金額有限，第四、五、六、七院皆未得資助。

沙園兒教院有五個區，即五座樓房、五個營房。我在第一區讀三班，算是高班。那時顧問委員會把兒教院定為四年制，我讀第三班，即第三年級，一年後便升上第四班了。院長希望我們成才，而非只接受救濟，所以請了崔載陽先生來，[5]讓他召集一些名人和教授組織編輯委員會，編寫《新中國兒童課本》。那時候我們只學三科，即中文、數學和政治，其中政治就是講我們和日本人打仗的事情。

我們穿童軍裝當作校服，童軍裝又叫「偷貓袋」，因為裡面的棉花，在天冷時會掉到衣服最底部，聚成一團，乍看像藏了一隻貓。我剛進兒教院時，看見大家沒有鞋子穿。初時我有鞋子，但不久被人偷去賣了。在兒教院的四年，我都沒有穿鞋子。學校原來給每位學生一雙草鞋，當大人物來參觀時便穿上，但平時我們絕不會穿，天冷時也一樣。那時每天都有早操，有一次，一個年紀比我小的同學哭著說：「下雪還要操。」老師才不管那麼多，畢竟她有鞋子穿呢。

此外，兒教院有很多醫療所。我剛到時，聽說院裡死了很多人，不過它安定下來後，就少很多了。當時痢疾肆虐，各個分院都缺乏醫藥，有不少學生因此病死。第二分院某班有四十人，病發後只剩下不到三個。那時有種外國的藥叫「金雞納霜」(Quinine)，[6]中國還不懂製造，只靠進口，而滇緬公路就是進口「金雞納霜」的唯一途徑。那為什麼會有痢痢呢？當時河水污染了，而我們又在河邊洗米和洗澡，所以就染病了。此外，那些搶救回來的小孩，差不多有一千人，很多都有水土不服的情況。

兒教院每班有四十個同學，由兩個導師管理。記得我班的導師叫馬慧時，另一位叫謝麗瓊。除了導師，那些年紀小的兒童還有奶媽照顧。導師有雙重身份，既是家長，又是老師。我們兒教院的創辦宗旨是「家校營場」，意思是它擔當家庭、學校、軍營、工場的角色，並實施「管教養衛」的教育理念，管即管束，教即教學，養即

[5] 崔載陽，廣東增城人，民國時曾任中山大學教授兼師範學院院長、大學研究院院長及教育研究所主任。

[6] 奎寧（Quinine），俗稱「金雞納霜」，用於解熱與及防治各種瘧疾。

給飯吃，衛即保衛。兒教院的紀律很嚴明，絕對不允許大同學欺負小同學，若有人觸犯，便要馬上受罰。

兒教院的生活也很有規律，我曾作詩記之：「軍號頻吹快起床，河中洗澡十分忙，歸來內務需齊疊，集合升旗仰首看。」內務就是把那張氈子疊成四方形，且有稜角，像豆腐一樣。在升國旗的時候，我們一邊看升旗，一邊唱歌，天天如此。看完升旗，我們便上課。上完課便吃午飯，飯後又上課。我們有時會幫忙製作麥芽糖和挖地種菜，有時會上山砍柴。第一區的同學，人人都要上山砍柴，或者割草，還記得當年在伐松樹時，鐮刀突然掉下來，結果弄傷了我的右背，現在右背上仍有傷痕。

兒教院的學生，來自五湖四海，說甚麼語言的都有。我們上課、唱歌時用國語，日常溝通用廣東話——沙園較多廣東人，只有兩個外省人。不過小孩子擅長學習新語言，那兩個外省同學很快便學會了廣東話。兒教院每區分八組，第一、二組為畢業班，第三、四組為準備班。我就是屬於準備班的。第二區由第九、十班開始，這樣慢慢順序排下去。我區同學的年齡相差很大，最大的有十四歲，我算是年紀比較大的，同學們稱我為「老人」。

吃飯時，我們大多蹲著吃，那時連老師也沒有椅子坐。我們以一個有六格的鋅鐵盤子盛菜，平時多吃芽菜、白菜或蘿蔔，但沒有肉吃。在沙園，只要風一吹，菜便鋪滿沙子。1941 年，三藩市華僑領袖司徒美堂和一班人到香港訪問，[7]並獲安排參觀兒教院。司徒美堂看見我們生活的情況，非常難過！回去後，便舉辦籌款活動，又捐贈衣服、鞋子、藥物、魚肝油等物資，送給兒教院。但僧多粥少，那些資助該如何分配呢？最後，每班挑選兩個最孱弱的同學，到院主任的飯堂吃飯。我身形瘦削，結果獲挑上了。那時除了白米飯，我們還會吃三樣菜：豬肝、瘦肉和一個蒸熟的雞蛋。我們吃的是軍米飯，有些人稱它為「倉底飯」。那些米是有洞的，被蟲蛀過。不過每區只有八個人能到主任飯堂吃飯，機會難得。吃完晚飯，我們還會滴魚油精呢。當時其他同學很羨慕我們！我們在那裡吃了一個月，然後拍了一張照片，寄給司徒美堂。

[7] 司徒美堂，廣東開平人，為著名旅美僑領及中國洪門致公黨創始人，並曾參與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。

力行中學

當時兒教院還辦了師範和工農院，[8]師範學生將來可以當初級教師。此外，還有力行中學，它是正規中學。除了那些想當教師的女學生外，同學們的第一志願多為力行中學，因為高中畢業後可上大學。當時力中在蓮塘，在兒教院總院旁邊。讀畢業班時，同學們就在蓮塘訓練一個月，學習中、英、數等，那時約有三百人參加。八月底，參加筆試，接著面試，並由院長主考。她會了解我們的為人及家庭狀況，比如問父親現在的情況等。成績好的同學，才能考入力行中學。如果獲得取錄，面試後就不用回七院，可直接入讀力行中學。當時大概有一百五十人考進力行中學。如果有些同學無意讀書，院長便介紹他去做事。

我們在兒教院畢業時，也寫過紀念冊，並保留至今。當時謝麗瓊老師說我勤快，又聰明，但身體不好，希望我將來能夠成為運動家。八年後，我真的參加了渡海泳，從九龍游到香港。我一共參加了兩次，第一次在 1950 年，次年又參加，每次都成功游到對岸。

在力行中學時，須要寄宿，衣食住行皆由學校提供，所以我很感激國家。力行中學的校服是草青色的，是那種有個口袋的童軍服，跟兒教院的差不多。天冷時，我們也沒有長褲穿。力行中學的男生約佔百分之七十，男多女小。1942 年至 1944 年間，我在力中讀書，並曾在 1943 年在第三班考到第一名，但學校沒有發獎品。其實那時我剛病倒，回家休息。那一年教務主任實行新制，最佳成績或最乖的同學，會升上一甲班；成績最差或品行不佳的同學，便去二丙班。我考第一名，卻被編去了二丙班，自此我便無心向學。到了三年級，那個教務主任走了，學校恢復原制，我也升上了三乙班。

那年十一月，我還沒有畢業，卻考上了廣東省政府的無線電班。[9]當時政府需要熟悉無線電的人才，因此開了一個訓練班。校方貼出通告，看誰有興趣，我因無心

---

[8] 按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記載：「爲了讓兒教院的畢業生能升上中等學校讀書，從 1940 年起，陸續開辦了實驗中學部（後改為私立力行中學，簡稱力中），北江簡易師範學校（後改名廣東省立江村師範學校，簡稱江師）和北江農工職業學校（簡稱北職）」。見《烽火歲月：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回憶錄》，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編輯組，1995 年，頁 21。

[9] 按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記載：「1944 年 11 月 18 日，有 56 名兒教生考上該無線電訊班，在韶關黃崗入學。力行中學學生占半數以上，其餘來自江師與北職，計有廖由祥、盧國雄、龍亮駒、葉錦明、陳慎遵……」。見《烽火歲月的豐碑：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回憶錄》，廣東兒童教養院院史編輯組，1995 年，頁 77。

向學，便去報考。當時約有六十人獲取錄，全是男生，且多是兒教院同學，只有兩、三個是外面的人。那時我約十六、七歲，獲取錄後，便離開力行中學，去了廣東省政府行政幹部訓練團。那行政幹部有什麼人呢？第一是科長級別或以上的行政人員，第二是警察學校訓練的人，第三是臨時政府人員。

無線電班

我們就在黃崗訓練，教官是政府官員。1945 年初，我們訓練了一個月，日本仔打到韶關，我們便逃往東江龍川。我們每個人都背著槍，和校長、老師一起走。我們大概有六十支槍，因為槍和子彈都比較重，所以我們只好走一天，休息一天，一共用了二十天時間。我很喜歡看書，因此帶了很多書，其他東西則不得不捨棄。當時龍川全國聞名，因為上北京的公交路經過龍川。我們住在龍川的祠堂。軍隊生活就是這樣，去到哪裡，都會住祠堂。我們在祠堂裡訓練，其間主要學習收發情報。那時接受訓練，還會得到零用錢呢。

無線電班結束後，很多同學被派到東莞、惠州的縣政府，餘下二十人（包括我）被派到廣東省保安司令部通訊大隊。我們每人有一支槍，每次出門都要帶上。軍隊有糧餉，每月獲發千多元，當時每支毛筆約二十元。我有個很善心的隊長，他向上級請求把我的糧餉調整到三千多元。當時我們只須交伙食費，不用買米。最初進去保安司令部時，我是見習官，即準尉見習官，負責收發無線電。

1945 年 8 月 15 日，我們還在龍川，司令部、省主席也在龍川。有一天，隊長請我們吃晚飯，每個電臺派了兩個人去，最後共有五人去。我不知為何沒興趣去，就在祠堂睡覺。隊長回來時拍拍我的肩膀，說：「陳慎遵，抗戰勝利了。」當時我還以為做夢，第二天我們就一起去喝酒慶祝，結果喝醉了。

1945 年 9 月，省政府的軍隊要回去了，我回到廣州的省政府保安司令部。那時中國已經勝利了，但因船不多，所以有些日本人仍留下來。省政府命令那些留下來的日本人去掃街。有一次，我和台長及一個服務員出去，雖然沒有帶槍，但穿著制服，其中一個日本人，就是五年前拿槍要我回頭敬禮的那個日本兵，竟走到我們面前敬禮。時移勢易，真是「莫欺少年窮」！

後來我四處調動，1946 年至 1947 年間，我在海南島海口。1947 年 12 月，我還穿著棉褲，就跟隨電臺調去廣州灣。廣州灣叫做粵桂南邊區，不屬於廣東省政府的管轄範圍。粵是廣東，桂是廣西，南是廣西南路。那時我們在粵桂南邊區剿匪總司令部。1948 年的 10 月，我離開廣州灣，在那裡前後不足一年時間。

回港團聚

1948 年 10 月，我從廣州灣坐船回到香港。我並非辭職，而是「開小差」，即私逃。一旦被捉，就要被槍決了。由於軍隊不讓我辭職，我趁台長到廣州拿新機的時候私逃。那時剛好有船準備前往廣州，我得知後，就立即收拾東西，並將錢和公印交給一位上士兵。[10]那個士兵也知道我要私逃，但這種事在當時來說很普通，只怕人把錢也帶走而已。我把錢交給他，叫他三天後才打電報告訴台長。此外，粵桂南剿匪司令部有三個分台，我在其中一個電台工作，和湛江市政府電台的官員很要好。那官員答應為我在電台工作三天，這樣那三天便沒有人知道我走了。此外，我打的電報並非直接給司令看，而是給翻譯官看。那個翻譯官正好是我力行中學的同學，他是第一屆的，我是第三屆的。他又幫我守住消息不發，這樣我才可以順利逃走。

我坐在前往廣州的船上，心裡很害怕。我真是大膽，那時台長和總司令部都在廣州呢！如能坐船直接抵達香港，該多好；但航班太少，只能坐鐵路。我在廣州留宿一晚，第二天坐火車去香港。1948 年的 9 月，我回到香港過中秋節。三天後，台長知道我逃跑了，但仍跟我通信，叫我把香港的地址給他，大家保持聯絡。他回去廣州灣的時候，途經香港，更來找我。我們喝茶聊天，我又送他到佐敦道碼頭乘船。後來他也私逃了，並來香港找我。那時我考入了啟德機場的無綫電臺，他還想我介紹他到電臺工作。

1948 年，我初回香港，帶著銀圓券，當時一銀圓券兌換成 1.26 港幣。我拿銀圓券去兌換港幣，卻不能立即兌換。那時新的港幣叫港新紙，面值很大，所以每出一次貨幣，物價就會調整一次，紙幣也會貶值一次。我記得當時要十萬元才吃到一碗雲吞麵，但貨幣沒有十萬元那麼大，所以我們將面值一萬元的錢疊起來，再用紙捆好，用袋子裝著錢去吃麵。當時沒有人會親手數錢，畢竟大家都能建立互信關係。以我在軍隊的月薪來計算，扣除日常開支，剩下來的錢大概相當於五元港幣。我把

[10] 上士為民國時期的軍階，上士(Staff Sergeant)之下的為中士，上士之上的為士官長。

從廣州灣帶回來的錢兌換成港元，以作保值。

至於家人，爸爸和哥哥較我早一點回到香港。二哥還在大陸某市學農藝，後來做了獸醫；在福州時，他曾被共產黨捉過，後來坐船回到香港。我還有一個弟弟，在抗戰勝利初期和鄉親一起加入軍隊，去了臺灣受訓。他學做炮兵，訓練後就調去青島。在解放戰爭時期，被共產黨捉了，後來成功逃走。在上海，他和一個當地人很投契，離開上海時把公家留給那人。後來那個上海人幫助他南來廣州，1951 年 3 月他也回港團聚了。

兒教院校友會

1950 年，我曾組織同學會，但不成功。1954 年，我去了婆羅洲，其間跟李松柏保持接觸。1965 年進入了大東電報局，又開始聯絡同學。直到 1973 年，我們終於成功組織同學會。我和院長一直保持聯絡，1971 年左右兒教院院長從美國回來探望我們，並一起在美麗華拍照留念，那天約有七十多人出席。大家再次見到昔日的老師和同學，十分興奮，同學均留下聯絡方法。當時有人提議組織同學會，第一班同學李剛在《華僑日報》經濟版做編輯，免費幫我們在報紙上刊登消息，召集同學參加同學會。同學們看到消息後，紛紛參加。於是，我們在普慶舉行了第一次同學會，當時有三百多人參加。大家推舉我做校友會籌備主席。

一年後，我正式成為第一屆校友會主席。當時來了數百人，籌集了七千元，但真正登記入會的同學卻只有百多人。那時香港政府嚴禁「左仔」，我們也有點害怕，不過那些左仔卻沒有來。有人曾打電話給我，問我是左還是右，我說我沒有政治立場。這百多人對政治沒有甚麼立場，我們也不是搞政治的人。1972 年，我們終於註冊成立了有限公司。1973 年，校友會正式成立，宗旨是聯誼和互助。至於廣州校友會，1984 年正式成立，比我們晚了十一年。不久，廣州校友會開始編印兒教院的《通訊》。

陳紹駒 (2008)

陳先生展示戰時手上的傷痕

陳先生重訪蓮塘 (1984)

2001 年陳先生重遊沙園河邊，作詩緬懷舊事。

「抗戰時期武水邊、撐船老漢雨晴天、幾回呼我斬頭鬼、搭渡從來不付錢」

陳先生珍藏兒教院通訊 (1949)

陳先生珍藏兒教院的童軍編隊橫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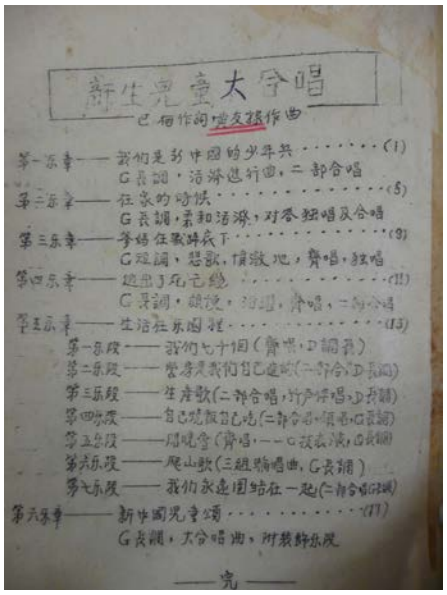
陳先生珍藏的力行中學校章

力中、江師、北職歡送電訊班同學 (1945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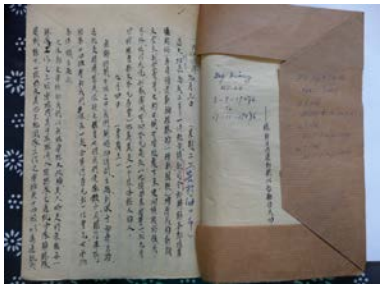
力中歡送志願從軍同學 (1945)

力中初二甲班同學 (1943, 蓮塘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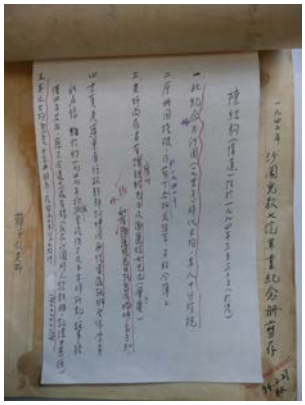
關德興先生於兒教院校友會成立一週年紀念日發言 (1974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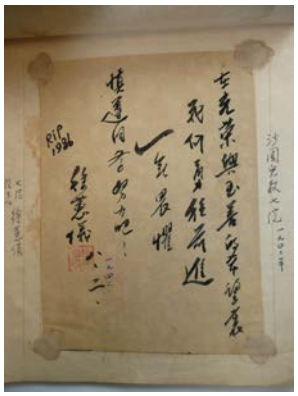
陳先生珍藏兒教院《新生兒童大合唱》歌譜 (1949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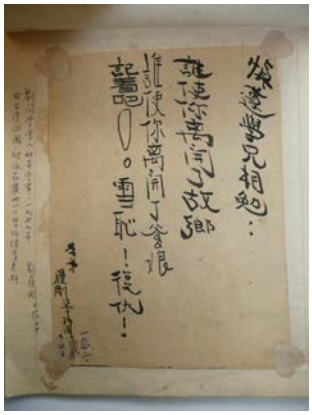
陳先生珍藏兒教院時期日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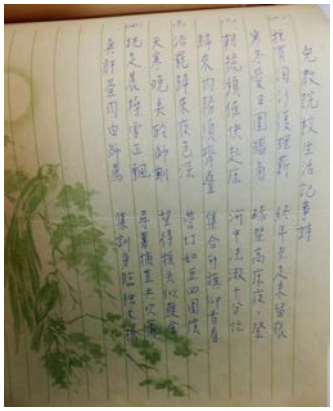
陳先生珍藏兒教院紀冊 (1942)



徐蕙儀院長留言 (1942)



同學留言，敵愾同仇



兒教院校生活記事詩